第一章　信息化战争呼唤军事理论创新

从人类文明史看，军事理论研究活动绵延数千年未曾停歇，值得注意的是，军事理论创新之路跌宕起伏，时而波峰时而低谷，时而繁荣时而沉寂，而每次理论创新的高潮，总是与军事变革不期而遇。因为每一次军事变革，都是对前一时代的军事形态的彻底改变，是军事形态从旧质向新质的质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作战样式、后勤保障等都发生着重大变化。人们在这些军事实践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深化对实践的认识。作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创新，同时创新的军事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人们的军事实践，引领着军事变革的发展和前进。

金属化变革时期，诞生了西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远征记》、《谋略例说》、《战术》,古代印度的《摩奴法论》,古代中国的《孙子兵法》等一大批军事著作，从理论的高度初步揭示了某些战争规律，形成了朴素、直观的战争观。火药化变革时期，拿破仑通过频繁的战争实践，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等，深入研究了战争的本质、原则以及军队建设等问题，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形成体系。马克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恩格斯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了大量军事问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成为人类军事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机械化变革时期，军事理论创新又一次空前繁荣，如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富勒的“机械化战争”理论、马汉的“制海权”理论、杜黑的“制空权”理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理论、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等，这些理论及其对战争的推动，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改造主客观世界方面的速度与力度。

当前正在蓬勃发展的信息化军事变革，同样催生了新一轮军事理论创新的高潮，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涌现出一些充满时代气息的军事思想，战争哲学理念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层变革。中国军队则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基础上，产生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这一面向信息化战争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指导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战争形态转型的高度研究和把握这次军事理论创新高潮的来龙去脉，对于继续有力推进我军军事理论创新乃至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践，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令人瞩目的世界军事理论创新大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化军事变革的酝酿、发展和质变，世界主要国家纷纷着眼打赢信息化战争和建设信息化军队进行军事理论创新，逐渐汇集成为汹涌的创新大潮，各种新观点、新思想层见叠出。

（一）军事理论创新发端于信息战个体研究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特别是每逢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总有一些先驱者，他们以其睿智的头脑和独特而富有预见性的眼光审视着这些变化，提出一些极富创造力、前瞻性和敏锐性的个人见解与主张，这些见解与主张引领人们对变革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历次军事变革中，每当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面临重大突破时，对于如何理解技术进步所蕴含的军事价值，如何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作战能力，个别杰出人士往往表现出惊人的远见卓识。恩格斯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正是这些“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所带来的观念突破，才使军事理论创新迈出了极为关键的第一步。

信息化军事变革初期，军事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各国学者、研究人员的创造性思维提供了广阔的驰骋空间。一些人瞄准信息化这个时代特征，提出和阐发了信息战争、信息战、信息战斗、计算机战等概念，初步探索和研讨了信息战理论。起初，这些相对独立的个体研究只在狭小的学术圈内产生影响，随着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些新见解吸引，激发出更为广泛的共鸣。许多军地学者竞相著书立说，桴鼓相应地勾勒、描绘着这一全新的战争形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现出不少名动一时的未来学家。他们认为，未来的信息社会，信息将成为比物质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主要围绕着信息的生产和分配来进行。① 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的代表著作有：美国人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夫

①参见沈伟光著：《新战争论》，第7～10页，人民出版社，1997。

妇的《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法国人米切尔·留利亚科夫斯基的《变幻莫测的未来社会》，日本人松田米津的《信息社会》等。其中，托夫勒夫妇的《第三次浪潮》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们的观点是，农业革命引发第一次浪潮，在战争领域有第一次浪潮战争，明显地带有第一次浪潮农业经济的特征。产业革命引发第二次浪潮，相应地有第二次浪潮战争，以大量征募军队和大规模破坏为特点。正在到来的信息革命迎来了第三次浪潮，战争也正在进入第三次浪潮战争，知识将成为军事力量的核心。

除了上述对信息社会和信息化战争宏观上的理论勾划以外，各国学者对于信息战理论内涵的深入探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1976 年美国军事理论家汤姆·罗纳在《武器系统与信息战争》的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信息战争”这一概念，指出“信息战争”是“决策系统之间的斗争”。精确制导武器在英阿马岛战争、叙以贝卡谷地之战中大显身手，使西方军事理论界更为坚信，“信息因素”必会在以后的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82 年，美国陆军有关领导人在撰文中结合风靡全球的托夫勒“浪潮”理论，进一步指出“第三次世界浪潮”将孕育出“信息时代的战争”。1984 年，美国空军的内部出版物中已开始使用“信息战斗”的术语。1985 年，美国海军少将小阿尔卡·加洛塔在《电子战与信息战》的论文中呼吁，鉴于电子战的内涵已扩展到保护己方的决策能力和攻击敌方的决策能力，用“信息战”的术语取代电子战更为合适。1989 年，两位美国情报战与电子战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病毒对抗”理论，不久美国国防部官方文件中“计算机战”、“计算机空间”等概念的使用频率开始增加。1991 年的海湾战争印证了此前西方军事学术界关于信息战初步理论的正确性，美国国防部官员艾伦·坎彭

甚至在他的专著《第一场信息战争》中认定，海湾战争是人类社会刚进入信息时代的第一次信息战争。① 此后，西方学者对信息战理论的研究全面铺开，在新的起点上、在拓宽的领域内更为深入地探讨信息战内容、本质、特点、规律、组织等方面的理论。

苏联的军事专家学者在早期的信息战理论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军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开始撰写学术理论文章认为，计算机、空间监视和远程导弹三种手段正在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军事技术，这种军事技术足以改变东西方的力量对比。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奥加尔科夫为代表的苏联军事理论家，开始关注远距离打击火力和信息系统相融合，形成一体化作战力量的发展趋势。奥加尔科夫最早提出了“侦察－打击综合体”的概念。他认为“侦察－打击综合体”把传感器和武器结合在一起，将会使进攻和防御的传统界线趋于模糊，让指挥员能够在比过去远得多的距离上发现目标，并能迅速有效地攻击这些目标。令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的奥加尔科夫忧心忡忡的是，当时苏军内部对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为此，他专门撰文指出，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现代化的过程中，观念上停滞不前或滞后的后果是最为严重的。②

尽管我国学者开展信息战研究的时间较美国、苏联迟，但军内外专家学者以高度的时代敏锐性跟踪、把握了军事理论创新的脉动。自 20 世纪 80 年中期以来，对信息化问题的关注已在军内外引起了广泛共鸣。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地方学者的沈伟光，从 1985 年开始研究信息战理论，发表了数万字的学术文章， 1987 年的《解放军报》曾专门

①参见王保存著：《世界新军事变革新论》，第 109～110 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

② 参见［美］约翰·阿奎拉、戴维·伦菲尔德等著，宋正华等译：《决战信息时代》，第 86 页，第 128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1990 年 3 月，他的专著《信息战》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即便今天看来亦未过时，并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如战争进入脑力战争时代、战争中的硬打击转为软毁伤、兵力对比要更多考虑信息力量的构成、打什么仗发展什么样的武器等等。

这些信息战个体研究的开创性成果，为后来有组织的军事理论创新活动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先导作用。在军事理论创新大潮蔚为壮观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铭记那些早期“弄潮儿”的智慧与勇气。

（二）美国走在信息化军事理论创新的前列

海湾战争是美国信息化军事理论创新的一道“分水岭”。此前以个体研究为主的局面，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迅即被打破。美国军方着手组织学术界系统地展开对信息化战争理论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理论的深入研究，走上了一条“官民结合、军地互动、需求牵引、全面推进”良性发展之路。由于美军原本具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系统，最庞大的经济基础和军费投入，加之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大量的实验模拟，美国的信息化军事理论创新很快结出硕果，领先于其他国家。

在美国军方主导下，学者、专家和研究机构全力参与，信息战研究的热潮迅速形成。1992 年 3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召集各大司令部的专家研讨指挥控制战，认为指挥控制战是实施信息战的一种军事战略，是通过信息战进行作战的一种方式。 1994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下令成立“军事革命指导委员会”，以指导各军兵种深入研究信息战的主要特征、战场信息环境及基本原则，并论证试编“联合信息军”的问题。1995 年 1 月，美国国防部成立“信息战执行委员会”，以确立国家信息战目标，制定信息战的有关政策。 1995 年 4 月，美国国

防部委托兰德公司研究信息战的下述问题：信息战的主要特征；强化信息战意识对国家安全保密的意义；信息战中的攻击与防护政策。同年，参联会在其公布的军事战略中，把实施信息战放在“打赢未来战争”的四项要素之首。[①] 这一时期，理论创新的焦点问题是信息主导下的联合作战。美国军事理论家们意识到，在战争中“最能详实掌握战场情况、最能有效地在自身各要素间传递信息、并能更快更准更远地使用武力的一方将获胜”，“胜负的关键取决于职能互动与协同的能力”。[②] 这样，阻碍信息在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之间顺畅流动的“信息烟囱”问题，成为信息化军队建设理论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上将适时提出“系统集成”理论，立即得到学术界众多的支持。这一理论强调按照“系统之系统”的集成性原则，把军队建设成为一个无缝连接的“大系统”，并使构成军队和战场的各要素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上的军事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于《2010 年联合构想》、《2020 年联合构想》等官方颁发的文件里。如《2010 年联合构想》阐述的主宰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等作战思想，《2020 年联合构想》提出的信息作战、全谱优势、联合指挥与控制、多国与跨部门行动等重要概念，无不闪耀着理论创新成果的火花。

这一时期美军提出了五花八门的信息化战争理论，但其中有两个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在全世界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力。一个是哈伦·厄尔曼和詹姆斯·韦德等在 1996 年提出的“震慑”理论。该理论提出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战略、战役、战术等全方位力量，打击目标指向敌对国家领导层及敌国军民的抵抗意志，以“震慑”手段达成迅速制

① 参见王保存著：《世界新军事变革新论》，第 111 页。

② ［美］威廉·欧文斯：《美国新军事革命回顾与展望》，《外国军事学术》2003 年第 8 期。

敌的目的，力求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①] 这一谋求“快速制敌之道”的新颖理论被融入联合部队司令部所提出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之中，形成了 1999 年 10 月颁布的《0.5 版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2001 年 5 月，在多次模拟仿真实验的基础上，联合部队司令部重新下发了《1.0 版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而后又很快修订为《2.0 版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最终在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运用，引起广泛关注。另外一个是 1997 年 4 月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上将首创的“网络中心战”理论。这一理论提出后不久便得到响应，1998 年 1 月，时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的阿瑟·塞布罗夫斯基中将[②] 在《海军军事杂志》上撰文《网络中心战：起源与未来》，详细阐述了该理论。更为系统介绍这一思想的是美国军事理论家大卫·艾伯茨等人于 1999 年 6 月出版的《网络中心战：发展和利用信息优势》一书。“网络中心战”理论随后引起了国防部高层的极大重视，并将其发展成为美军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战争的指导理论。2001 年 7 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长达 1000 多页的《网络中心战报告》，全面阐述了“网络中心战”的内涵，推出“网络中心战”的目的与意义，实现“网络中心战”的条件、途径、战略与措施。[③] 2003 年 4 月，美国国防部颁发《国防部转型计划指南》就吸纳了“网络中心战”理论，明确提出了军事转型的目标：从根本上建立以网络为中心的分散配置的联合部队，具备快速决策优势，能在整个战场空间实施集中效果的作战。

① 哈伦·K. 厄尔曼、唐姆士·P. 韦德：《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阿瑟·塞布罗夫斯基海军中将被誉为“网络中心战之父”，2001 年 12 月，他在退役之后被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任命为国防部首任部队转型办公室主任。参见彼德·东布罗夫斯基：《新世纪美国军事转型计划》，《外国军事学术》2003 年第 4 期。

③ 参见王保存著：《世界新军事变革新论》，第 289～290 页。

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成果不断被吸收到条令条例、作战纲要、军队发展规划乃至防务审查报告、国防报告中去，用于提升美军的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用于指导局部战争实践。理论创新成果的快速物化和转化，不仅有力推动美军信息化建设的快速推进，而且还反过来促进了军事理论本身的深入发展，使美国在军事技术变革和军事理论创新两个方面同时走在了世界前列。

（三）世界主要国家广泛进行军事理论创新

当美国在军事理论创新的快车道上急驰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如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印度等，也充分认识到新军事变革乃大势所趋，创新军事理论时不我待，因而，纷纷迈开了奋起直追的步伐，由官方主导，发动学术界全力参与，把智慧和力量聚焦到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的“主战场”，最终形成了世界性的军事理论创新大潮。

中国的军事理论创新在海湾战争之后呈加速之势，对于新军事变革、信息化建军、信息化战争等问题的理论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收获了累累的理论硕果。在 1995 年 2 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开展了“21 世纪的军队与战争”主题讨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普丰撰文《迎接信息战争的挑战》，论述了“信息战争是信息时代的必然”，分析信息战争的形态、特点和影响，提出迎接信息战争挑战的思路。参与讨论的其他文章从信息化的陆战场、海战场、空中战场以及作战理论变革、军队建设变革等方面探讨了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发展趋势。在 1996 年 2 月出版的《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又开展了“迎接新军事革命挑战”的主题讨论，中国工程院院长、国防科工委主任朱光亚撰文指出“：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军事革命时期”；“信息技术是这次

革命的核心和基础。”信息和知识是现代战争力量的倍增器。“以信息为主导的技术和系统综合成一个大系统，形成全新的作战能力。”“消耗战”将转向“节约战”，未来战场将是“非线性”战场，未来战斗将是“非接触战斗”，未来指挥将是横向联通的“网络型”指挥。这组讨论文章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迎接信息化战争的战略举措。江泽民同志高度关注信息化战争的发展，他指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我军发展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坚定不移地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积极推进我军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① 在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军事理论界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弘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信息化军队”、“军队信息化建设和机械化建设”、“信息化战争”、“制网电权”、“制交通权”、“网电一体战”、“信息主导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一体化训练”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和概念。

俄罗斯十分重视信息技术、信息化武器和信息战问题的研究。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科学顾问、退休海军上将彼罗诺夫认为：在海湾战争中，由于采用信息技术，多国部队的作战能力提高了一倍；假如两支部队其他条件相同，但一支在信息手段上优于另一支，那么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就大得多；现在若不计算一支部队的信息作战能力，兵力之间的作战潜力对比就变得毫无意义；在现代武装斗争中，夺取现代信息优势的斗争是确保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因素。俄罗斯的军事学术界还提出了“军事上的优势源于信息系统和信息化装备”，“信息

① 《解放军报》，2004 年 3 月 12 日，第 1 版。

化武器优势是克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提高作战能力的最佳方式是提高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信息支援能力”等独到的理论观点。鉴于不同国家对‘信息战’、‘信息行动’、‘信息时代的战争’等概念使用的混乱，俄罗斯军事学术界对信息战的定义进行了系统界定：其一，信息战是敌对双方为争夺和保持信息优势而采取的解决冲突的一种手段。为此，一方要对另一方的决策系统、人口稠密地区和信息资源实施信息 - 心理攻击，施加信息 - 技术影响，同时在其他手段的支援下，摧毁敌人的指挥控制系统及其信息资源设施；其二，在进攻和防御部队遂行战略战役任务时的信息战，是指情报预警、指挥控制、通信、欺骗及电子战部队，为达成作战目标而精心筹划和严密组织实施的各种协同一致的行动。俄罗斯军事领导人进而提出，凡是对俄罗斯及其武装部队实施的信息战，不管是否造成伤亡，均被视为一种军事冲突。1995 年底，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载文提出了“信息武器的定义”，介绍了美国已拥有和正在开发的信息战武器，强调俄罗斯必须做出反应，研究相应的对策。1997 年第 2 期《军事思想》杂志上，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士沃罗比约少将发表文章提出了“信息心理战”和“可控性战争”的概念，认为“可控性战争”是信息时代战争的模式，在这种战争中“信息心理战”占有核心位置，它可破坏敌国的信息资源、指挥系统和抵抗意志。这些理论成果在新版《俄联邦军事学说》中有所体现。普京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后，提出要加快俄罗斯军事改革的步伐，以均衡发展为方针，以适度发展为目标，以内涵式发展为重点，其中加强常规部队的信息化建设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普京总统还多次召集军事专家举行专门会议，研究伊拉克战争对俄军建设以及军事改革的影响。

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军事理论创新的起点较高，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重视信息战研究和信息战能力开发。英国军方人士认为，信息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武器，谁拥有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制胜的钥匙。德国军内外人士从信息社会必将孕育出新的战争形态的高度来认识信息战争，他们的共识是，在信息战研究方面，他们已经落在了美国人的后面，必须急起直追。为此，德国国防部成立了信息战研究机构，让一批有头脑的军官跟踪外军特别是美军研究信息战的情况，为德国发展信息战理论、制定信息战条令提出建议。西班牙的军方学者认为，21 世纪的信息战中，也许听不到炮弹的爆炸声，使用的只有计算机显示器、鼠标和键盘，除在战场上行走的机器人外，就是计算机化的士兵。

日本和印度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进行军事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够在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本国化改造。以“信息战”的概念为例，日本的军事理论家认为，信息战是在和平时期、危机爆发时、危机加深时、爆发战争时、战争进行时、战争结束时和战后重建时的各个时期，在战略、战役、战术层次上，在竞争者、对手和敌我之间，使用各种手段以达成既定目标的信息行动。信息战包括 7 种作战类型：指挥控制战、以信息为基础的作战、电子战、心理战、黑客战、经济信息战和网络空间战。印度的军事专家认为，信息战包括多种作战样式，主要有指挥控制战、情报战、心理战、电子战、计算机战、黑客战、经济信息战等。①

从整体上看，各国的军事理论创新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是指没有一个国家闭目塞听，全然拒绝更改现有军事理论。相反，大多数国家都是瞄准信息化这个新军事变革的核心，在新的起点上研

①参见王保存著：《世界新军事变革新论》，第 113～118 页。

究、探索军事理论，力图跟上先进国家的创新步伐。特殊性是指由于各国的战略利益诉求、经济技术力量、军队实力和组织机构不同，在创新军事理论时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本国的方式，打造适合本国国情军情的信息化军事理论。而且，在信息时代，借助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信息的跨国流动几乎是零成本的。后发国家完全有条件实时高效地获取和利用先进国家的有用信息，从而为各国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迎头赶上提供了可能。目前，各国军事理论创新进度不一，先进国家要保持优势，其他国家力争赶超先进，这种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局面构成了世界新军事变革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二、引发军事理论创新大潮的主要因素

从历次军事变革看，把技术“物化”为武器装备相对较为容易，而根据新的武器装备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则较难，所以“新瓶装旧酒”的历史现象并不少见。那么，为什么这次新军事变革会形成如此汹涌澎湃的军事理论创新潮流？究其原因，主要是科技进步、战略需求和战争实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军事技术发展推动军事理论创新

自从战争出现以来，敌对双方总是优先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运用于军事领域，改变军队物质技术条件和提高战争准备水平。军事技术上的飞跃性进步，强制性地使战争形态、战争规模、战争手段、作战方法和军队体制编制等发生相应的变革，从而极为深刻地改变了军事理论研究的客体——军事领域内的对抗活动。正如恩格斯的一句经

典名言中所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性，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是变革。’① 存在决定意识，军事理论研究客体产生的深刻变化，会在研究主体的头脑中产生强烈的反应，迫使研究主体从新的视域或视点对这种变化进行认识、理解、解释与预测，从而促使军事理论的创新。同时，军事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在军事科学的范畴内形成一些相应的交叉学科与边缘学科，使军事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范式、技术手段乃至思维方式等也发生了相应改变。这样，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突破，军事理论研究在主、客体两方面都会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最终必然促使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推进美国军队转型》的演讲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如回到中世纪，给著名的英国亚瑟王宫廷中的某一位骑士发一支 M－16 自动步枪，他会怎么做呢？如果他拿着这件武器，骑上他的马，用枪托砸他对手的脑袋，这样就不是转型。如果他躲在一棵树后边，向他的对手射击，这样做才是转型。在这个故事中，M－16 自动步枪要是按照冷兵器的使用方法当然不会产生应有的威力，它的出现必然会迫使那位骑士用新的眼光认识手中武器，并探索最适合新武器的使用方法。所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必然会形成一种创新军事理论的内在驱动力。

军事变革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规律。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大体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军事技术变革。第一次开始于 18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17 页，战士出版社，1981。

世纪后期。在冶金学、机械学、工程学、化学、弹道学有了重大进展的基础上，传统的火器制造技术迅速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性能不断改进的新型后装线膛枪炮开始在战争中广泛使用，交战双方作战方式和军队组织方法得到了根本改变。与之相适应，诞生出拿破仑、格兰特、毛奇等人的军事思想，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第二次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磁学、相对论等新学科的创立以及动力机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为标志，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出无数奇迹。内燃机、电动机先后发明，坦克、飞机、航母、无线电、雷达等自动化武器相继问世，人类进入了机械化战争时代。这一时期，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与当时的技术进步成果相对应的军事理论竞相问世，如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利德尔·哈特和J·F·C·富勒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杜黑的“制空权”理论、米切尔的“空中力量”理论、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理论等等。第三次是起源于20世纪中期。由于核技术、火箭技术的重大突破，原子弹、战略导弹大量制造，使战争进入了核子化时代。出于对核技术的理解，人们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认识也打上了核时代的深深烙印，如“核冬天”理论、“遏制”理论、“确保摧毁”理论、“第一次核打击”理论、“确保生存”理论、“有限战争”理论、“火箭核战略”理论等等。

同样，信息化军事理论创新大潮也是在军事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直接推动下兴起的。二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等高新技术群的迅速发展，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科技革命。这场革命中，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和利用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信息技术成为主导性技术，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要素。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

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军事技术革命，引起了武器装备跨代性发展、军队组织结构调整和作战样式的革命性变化。从武器装备看，正由机械化兵器转化为信息化兵器，除 C^4ISR、GIG （全球信息栅格）系统外，还有信息化弹药、信息化作战平台和数字化单兵武器等。从组织结构看，新的军兵种开始出现，如计算机应急反应部队与网络部队、防核生化和水下作战的“机器人部队”、航空航天部队等；军队规模大幅度缩小，部队编制正由传统的合成化向多功能小型化转变；军队技术构成提高，技术密集型军兵种的比例不断增大。从作战方式看，二战以来形成的传统作战样式经历着彻底的变革：从以打击系统对抗为主转向信息系统对抗为主；从逐次消耗摧毁敌有生力量到同时摧毁敌指挥系统；从线式作战到多种战法全纵深同时打击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呼唤：必须创新军事理论，形成与军事领域诸要素的革命性进步相协调的新的军事理论体系。近年来风行一时的“信息战”、“非接触作战”、“非线性作战”、“联合作战”、“网络中心战”等理论，都不难发现隐匿其后的信息技术“这只手”。

（二）国家战略需求牵引军事理论创新

军事理论创新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任何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都是特定阶级、集团、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在军事上的集中反映。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改变、国家的战略利益取向进行调整时，必然会对军事理论提出新的要求，极大地激发军事理论创新。这种规律已经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面对欧洲列强的干预，保卫革命果实、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在法国人民、法国军队中引发了巨大的热情，他们以空前的创造力改写着“国王时代”的军事理论。由于法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府库空虚，军队混乱，惟一

资产是大量拥护革命的群众，于是法国人民以国民议会法令形式创造出“征兵制”。对此，《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11 版有如下评价：“在任何国家的现行或未来的法典中，能够对人类未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法令能超过法国这个不太著名的法令。”① 然而，通过征兵得到的战斗人员缺乏训练，纪律较差，难以掌握当时作战中采用的线式队形变换。于是，聪明的法国人民更改了“国王运动”的规则，发明出散兵线、瞄准射击和纵队冲锋战术。此外，他们还改革了武器装备、行军、宿营和后勤补给等方面的指导理论。再加上拿破仑个人的天才，这一切就形成了指导法国军队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军事思想。“海权论”等军事理论的提出，也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海上扩张、建立海上霸权的战略需要。“闪击战”理论，同样是在法西斯德国称霸世界战略图谋的支配下产生的。20 世纪初到 90 年代的国际战略格局经历了“法兰克福”格局到“凡尔赛－华盛顿”格局再到“雅尔塔”格局的演进过程，这种变化在军事理论发展中留下了长长的投影。特别是冷战期间，各种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如美国的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新灵活反应战略、空地一体战理论，苏联的火箭核战争理论、大纵深作战理论等等，都深深打上了两极格局下美苏争霸的烙印。

这次面向信息化战争的军事理论创新，也是在战略需求的有力牵引下产生和发展的。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战争的失利及其引发的国内危机，迫使美国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与此同时，苏联乘机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战略扩张，在霸权的角逐中渐渐取得了优势。即便是在美国传统的战略重点地区——欧洲，力量的天平也开始向苏联一方倾斜：

① 转引自［英］J·F·C·富勒著，绽旭译：《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